【卷首语】

博雅教育

古罗马的西塞罗在《论演说》中曾以 humanitas 指称一种独特的教育纲领。这种以人文为核心的教育，后来衍化为包括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七个科目的自由七艺(septem artes liberales)。古代儒家的教育，则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无论是古罗马人的七艺还是儒家六艺，都体现了一种使人性臻于完善的教育理想。这一教育纲领与科目设置，并不以教授实用的技艺为目的，但却是一切专门技艺及深造的基础。它让学生摆脱庸俗，唤醒卓异，其所成就的，不是没有灵魂的专门家，而是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对此，人们称之为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

当年曾国藩赴京会试，中式三甲第 38 名进士，朝考一等，点了翰林。这位湘乡来的"老农"(章太炎语)便踌躇满志，以为天下学问尽在于己。等到他遍拜当时京中的文化冠冕，结果发现人家所谈的学问，竟都是自己闻所未闻的。爽然若失的曾氏，这才知道以前所习的八股制艺，其实只是块用过后就该扔掉的敲门砖。他在家书中感叹说："此中(指科举制艺)误人终身多矣。"曾氏从此发奋向学，转益多师，最终凝成了具有博通风范的"士大夫之学"。曾氏的士大夫之学，是一种"无用之学"，但是他以之治军，练成了一支所向披靡的湘军；以之从政，成为一代中兴名臣；以之治学，则蔚然成为儒宗。

所谓"博雅教育"，质言之，就是"每件事都知道一点，有一件事知道的多一些。"(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语)而社会理论的知识，则是这一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

王　焱

2005 年 9 月 28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主　　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焱
助　　理　王萍
责任编辑　王海玲

【卷首语】

王　焱　博雅教育/1

【茶烟一缕】

邵　建　“群众”这个口头禅/4

李远山　追求“自由身”的金圣叹/6

刘孝存　从“江湖八门”说起/11

戈　革　我曾送给钱钟书先生几件寿礼/16

袁济喜　汉代士人与尘世孤游/20

张立升　酿制人生/25

【本辑聚焦 大学改革与人文精神】

杨东平　大学人文精神的式微与重建/29

王岳川　大学改革的瓶颈/33

王成军　大学是一连串的事件——美国大学制度变迁的启示/38

姚天皎　围城之内/44

【学术沙龙】

邹波涛　《哥本哈根》的历史透视/47

杨春时　城市与人/53

王　欣　饮食文化视野下的中西法理念/58

陈蓉霞　女权主义在中国的曲折之路/66
【社会经 纬】
苏国勋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之二/71
陈　辉　透视廉政公署 /79
仇立平　上海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分化和整合/85
刘　耳　贵族婚姻家庭模式的功能分析/93
王晓华　西方人的分餐制是怎样形成的？/99
【夜读漫记】
江　渝　解读执行力文化/104
王澄霞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女人？
——从女性批评视角解读小说《花好月圆》/112
张莉彬　关于裂缝与桥的人类学寓言/118
【海客谈瀛】
薛　涌　正视二战的遗产/122
夏星〔挪威〕　现代性学与 SEXUALITY/125
吴万伟编译　与批评家帕格丽亚对话（上篇）/130
【众生世相】
翟学伟　一场游戏一场梦——在网络社会交往的虚实之间 /138
赵铁林　黄明芳跑“老票”的人们（下篇）——老北京话城南之六/146
【学术资讯】
◇从数字中感受危机◇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美国报章再炒中国‘光棍炸弹’问题◇打仗,还是做爱？◇作为心理病态的虚荣◇一位社会学系毕业生与老师的通信◇趣味、时尚与现代社会

封二　海森堡与玻尔
封三　美国人居城市科罗拉多一角

“群众”这个口头禅

邵　建 *

还是在“两会”期间,当然也包括平时,常听到“群众”一词被各种代表、官员挂在嘴边,成了“口头禅”。什么“据群众反映”、“为群众考虑”,“解决群众问题”,就连一些普通公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张口就是“要提请群众注意”,还有我们平时常用的“群众团体”、“群众组织”、“群众运动”等,体制内还有的工作部门叫“群工部”,不一而足。长期以来,每一次看到或听到这个大家都习以为常的词便本能地感到不舒服。

在我看来,“群众”一词在公共领域中的流行是典型的“政治不正确”,它是一个含带蔑视性的称呼,说话人使用它时总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至少他是外在于这个群体的,而这个群体,也就是芸芸众生。

“群”的本义是“羊群”,后泛推为“兽群”及“人群”。这一渊源便含着对人的不敬。《国语·周语》曰“兽三为群”,后《晋书》又曰“三人为之群”。作为生物性的对象,人,只要群在一起,众成一团,彼此声气相应,还真容易因激起的情绪而沦为某种意义上的非人。不用说,由它导致的后果往往令人不堪,所谓“法不责众”,是连法拿它都没辙。事实正是如此,无论当年的法国大革命,还是后来的俄国大革命,以及再后来,人作为个体一旦淹没于一个庞大的群体中(比如广场),就会被裹挟而丧失自己的理性。因此,群众带有“乌合之众”的意思。否则何来当年“发动群众”之说,这是把人众当作一个可运作的对象。再者,“群”又作“羣”。从左右结构到上下结构,可以意会出来的含义更明显。群羊无主,抑或群龙无首,它们是被驱遣的,并且需要领头的上面的“君”,即“君领”,即“统治”。《礼记》曰:“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在传统型的社

*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会结构中，君王与民群是一个条形系统，它们之间不但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且这种统治就像驱使群羊一样。然而，这种关系上的不平等，非独古代，现代依然。也许这句话我们耳熟能详：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里的“我们”和“群众”摆明是两个分属，所以用“群众”来教训“我们”，是因为“我们”自以为“我们”优越于“群众”。这句话看起来拔高了“群众”，其实正隐含了原先意义上的不平等。

当然，在一些日常用语中，“群”未必都带贬义，如“群雄”、“群芳”、“群情”、“群策群力”等。但，这个词一旦进入公共领域，一旦在公共事务上使用，尤其是和“众”并列时，语用者那种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不屑——语词本身的不屑——便发散出来。如果说任何称谓都表明一种关系，“父亲”表示他和子女的关系，“丈夫”表示他和妻子的关系，“总统”表示他和选民的关系，那么，这个称谓表明的关系是什么呢？什么都不是。“群”也好，“众”也罢，它是且仅是一个数量的集合。把不同身份和不同面目的人纳入到一个纯粹的数量中，或用一个纯粹的数量来取代每一个人的具体的身份和面目。你能说这种称谓有起码的人格尊重？

假如你是一个代表，比如“人大代表”，请问，你代表的是谁？“群众”？不，你不是群众代表，你是公民代表。你受委托的是一个一个的公民而不是一个没有面目的群众。群众除了被驱遣，什么也不会做。假如你是一个官员，你在为谁服务？也不是群众，而是纳税人，因为是纳税人雇用了你。纳税人如果是一种具体的身份，群众却什么也不是。同样，作为习称，“群众组织”和“群众团体”，在英美它们常常被称为“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或“公民团体”等。也就是说，在公共领域中，凡是使用“群众”一词的地方，我们其实都能找到更合适也更准确的词替代它，而它在任何意义上都显得极不合适。

根据以上，我以为，从“政治正确”的角度，“群众”这个词应予淘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追求“自由身”的金圣叹

李远山 *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特立独行的一位奇人,他追求有一个“自由身”。他是冤死的。

金圣叹是文学批评家，相信许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把《庄子》、《离骚》、《史记》、《杜(甫)诗》、《水浒传》、《西厢记》称为“六才子书”,计划一一加以评解。金圣叹在写给金昌(他的叔伯兄弟,曾从金圣叹学《易》20 年,并事以师礼)的《绝命词》中说:“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司马迁,此指《史记》)、杜(杜甫诗)待何如。”由此可知,在金圣叹评点“六才子书”的计划中,他生前只完成了对《水浒传》、《西厢记》的评点,《杜诗解》虽已进行但并未完成,而评点《庄子》、《离骚》、《史记》则更只是他的一个“愿望”和“目标”,尚未真正着手写作。对于金圣叹的文学批评,有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纵横批评,明快如火,辛辣如老吏。笔跃句舞，一时见者，叹为灵鬼转世。”

虽然金圣叹主要是以文学批评而闻名于世，但本文却不打算议论他的文学批评。

“世间难得自由身”

金圣叹(1607～1661 年),名喟,字若采,又字圣叹,明亡后改名人瑞。“圣叹”二字的含义出自《论语》。金圣叹说:“‘圣叹’即‘喟然叹之意’。”在《论语》中,“喟然叹”这三个字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子罕篇》,记颜渊赞美孔子时云“颜渊喟然叹曰”;另一次是在《先进篇》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该章记述了孔子与几位弟子讨论人生态度和理想的对话，其中曾皙的人生态度和理想受到了孔子的称赞：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教授。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赞成)点(曾皙)’也。”在这两次‘喟然叹’中,前一次‘喟然叹’是颜渊的‘喟然叹’,金圣叹说这是‘叹圣(对圣人的赞叹)’,而后一次‘喟然叹’则是圣人孔子对曾皙的‘喟然叹’,金圣叹说这就不是‘叹圣’而是‘圣叹(圣人的赞叹)’了。金圣叹说：春风沂水,予(我)其为点(曾皙)之流亚(同类)欤？由此可见,金圣叹自视很高,自命很高,他的人生目标和理想乃是要成为一个能够被圣人所赞叹的人！

金圣叹学问渊博,善于‘讲演’：‘每升座开讲,声音洪亮,顾盼伟然。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坐下缁白（黑发人和白发人）四众，顶礼膜拜，叹未曾有。先生则拊掌自豪，虽向之讲学者闻之攒眉浩叹，不顾也！’由此来看，作为一位讲课‘老师’的金圣叹,无论在讲课内容上还是在讲课艺术上,都可以说是‘绝对一流’的。金圣叹讲课的此情此景，实在要令许多现今社会中之‘为人师者’赞叹不已,心向往之。

金圣叹自视很高。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的理想和他的性格使他不能按照当时的‘社会常规’走仕进之路。廖燕《金圣叹先生传》说他‘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他确实是一个具有超凡脱俗性格的人，他的一些行事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颇为惊世骇俗的。在封建社会中，科举考试不但是一件人生大事，而且是一件社会大事。金圣叹参加考试时,遇到的考试题目是‘如此则动心否乎’。对于这个‘试题’,他在‘答题试卷’的最后说：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葭苍而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曰：‘动动动……’”金圣叹接连书写了39个‘动’字。考官感到奇怪,问金圣叹这是什么意思,金圣叹说：只注重‘四十不’三字耳！原来,作为考生的金圣叹又给考官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目：39个‘动’意味着‘四十不动心’,也就是‘四十而不惑’的意思。

第二年考试,金圣叹故伎重演。这一年的考题是‘孟子将朝王’,而金圣叹却只在考卷四角写了四个‘吁’字。这是什么含义呢？金圣叹说,考题中‘孟子’二字不必作,因为《孟子》一书中到处都有‘孟子’二字,‘朝王’二字也不必作,因为孟子所朝之王也太多,剩下来只有‘将’字可作。在演戏时,王将上朝的时候,必先有内侍发出‘吁’声,预告王将出

场,于是“吁”就是“将”的象征了。

——金圣叹就是这样对待科举考试的。

毫无疑问，这样对待科举考试，金圣叹对其后果是一清二楚的，他知道他这样做必然要被考官除名。对于这个意料之中的结果，金圣叹一笑置之,他说:“今日可还我自由身矣!”有人问“自由身”三字出自何书,金圣叹答曰:“‘酒边多见自由身’,张籍诗也。‘忙闲皆是自由身’,司空图诗也。‘世间难得自由身’,罗隐诗也。‘无荣无辱自由身’,寇准诗也。‘三山虽好在,惜取自由身’,朱子诗也。”

由此可见,金圣叹是极其重视“自由身”的人。在他心中,高官厚禄是可以弃之如敝屣的,而“自由身”才是“至爱”。

应该强调的是,在中国思想传统中“身”的含义绝不仅仅是指肉体之“身”。儒家讲究“修身”,这儒家传统中的“修身”二字绝不是指现代意义上的“体育锻炼”或“锻炼身体”,而是指“精神境界的提高”,指人在“思想修养和实践上提高”。这就是说,中国传统中所说的“身”是“身心统一”之“身”,言“身”而“心”亦包括其中了。所以,金圣叹对“自由身”的重视和追求,实际上是既包括了对狭义的“自由身”的追求,又包括了对今人所说的“自由心”的追求的。

金圣叹之死

金圣叹死于一宗冤案。

顺治十七年(1660 年），吴县来了一位新县令任维初。这位县令既贪且酷，为了催征兵饷，残酷地拷打民众，甚至把人杖毙于堂下。与此同时,他又从官仓中取出仓米,粜米自肥。时人云:“自明太祖立法,至我朝(指清朝)定鼎以来,未有如维初之典守自盗者也。”当是时也,虽三尺童子皆怀不平。”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谋划上告，驱逐这个贪官。这时恰逢顺治皇帝驾崩，巡抚朱国治设幕哭临（众哭曰临),庠生倪用宾等人就趁巡抚朱国治在时一拥而入,鸣钟击鼓,跪进揭贴，群众闻讯而至者有千余人，要求驱逐任维初。巡抚朱国治见状大惊,命令手下擒拿诸生,倪用宾等 11人被擒，众人散去。巡抚朱国治包庇任维初,给倪用宾等人加上“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目无朝

廷”;“匿名揭贴”;“串凶党数千人,群集学府”等罪名。在此案的审讯过程中,金圣叹也被牵连其中,而此案最后的审判结果是:倪用宾、金圣叹等18人,不分首从,立决处斩,妻子、奴仆、家资、财产、田地入官。

金圣叹在狱中时,曾写书信给家中,曰:“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可以看出,金圣叹心中充满了悲痛和悲愤之情。

倪用宾一案,入狱者在狱中都受了酷刑。《辛丑记闻》中具体谈到了沈大章的惨状,对于金圣叹受刑的情况虽然没有具体言及,但人们是不难想见的。

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金圣叹在绝境之中,又同审判他的法官开了一个“最后的玩笑”。金圣叹在给妻子写最后一封信时,知道他的信一定会先落到那些审讯法官的手中,于是,就在信中说:“字付大儿看,腌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我们难以猜测那些把金圣叹置于死地的人在看到这段文字时是什么反应,也许那个兽心的朱国治愚蠢无比,看不出金圣叹在捉弄他们,但当时的确有一位法官看出了金圣叹的“微言大义”,他说:“金圣叹死犹侮人。”听到金圣叹生命最后阶段的这件轶事,我想,许多人都会感到一阵心痛的。

后来,新巡抚韩心康到任,“以别案斩任维初于江宁之三山街”;朱国治在云南“刻剥军粮,将士积愤,乃脔而食之”。任维初和朱国治最后都没有好下场,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恶有恶报”吧。

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中,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而入狱者颇多,可是被判死刑者却并不多见。许多人都知道嵇康和陆机二人——特别是嵇康——是蒙冤而死的。嵇康临刑前,“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嵇康死前最后一次弹奏《广陵散》,而《广陵散》遂成为历史绝唱。现代作家还把此事写成了小说。在许多人眼中,陆机是一个文人,他的《文赋》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著,但其祖父陆逊为东吴名将,关羽就败死在陆逊之手,其父陆抗为东吴大司马,陆机实乃名将之后。陆机在吴亡后十年不仕,但终于入洛阳“参与政治”,在晋朝复杂残酷的上层争斗中,陆机受成都王之命为河北大都督,率20万人讨伐长沙王,兵败遇害。陆机虽然战败,但“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

虽然在同是冤死这一点上，金圣叹与嵇康、陆机二人有类似之处，但仔细考察案情的性质和类型，嵇康和陆机二人都是在“政治的上层斗争”中遇害的，而金圣叹却是在一场民众与贪官污吏的斗争中蒙冤遇害的，从这个方面看，金圣叹之死还是与嵇、陆二人之死大有不同的。

如果说金圣叹走上刑场是“无意得之”，那么，金圣叹在考场上之所为以及随后的落选就是他“有意为之”了。

金圣叹对于他在科场上那种行为的结果是了然于心的，他选择脱离仕途而得到了他的“自由身”，而上文已经指出，金圣叹所谓“自由身”的一个具体含义就是指个人的“自由思想”。

西方社会科学中的“自由”概念是近代的严复首先介绍到中国的。1899年，严复把密尔(John Stuart Mill，亦译为弥尔或穆勒)的 On Liberty (最初书名定为《自由释义》，1903年出版时改为《群己权界论》)翻译为中文。在思考应该怎样翻译 liberty 时，严复踌躇再三，不知应该怎样翻译才好。后来他偶然吟诵起柳宗元的《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心中猛然醒悟，叹道：“所谓自由，正此意也。”

严复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政界自由之意，原为我国所不谈。即自唐虞三代，至于今时，中国言治之书浩如烟海，亦未闻有持民得自由即为治道之盛者。”虽然中国没有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概念，但却不能说中国历史上完全没有思想史意义上的自由思想与概念。所以，严复本人又说：“吾观韩退之《伯夷颂》，美其特立独行，虽天下非(非难)之不顾。王介甫(王安石)亦谓圣贤必不徇流俗，此亦可谓自由之至者矣。至朱晦翁（朱熹）谓虽孔子所言亦须明白讨个是非，则尤为卓荦俊伟之言。”从本文所介绍的金圣叹的生平来看，我们可以说：在严复所举诸人之外，我们实在也可以把金圣叹“补充”在中国古代追求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行列之中。

我们不但应该知道金圣叹是一位文学批评家，而且还应该留下另一个历史记忆：金圣叹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

从“江湖八门”说起

刘孝存*

一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受古典小说、武侠小说和黑幕小说的影响，“江湖”是和啸聚山林的“绿林”、“绿林好汉”、“武林”及“武林豪杰”乃至“黑社会”与“帮会”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理解固然不能说全然不对，但这只是狭义的江湖概念。从广义上讲，“江湖”就是四方各地，泛指民间。如果说与“江湖”相对应的是“庙堂”(朝廷)的话，那么与“民间”相对应的就该是“官场”。如此，可不可以说“官场”之外都是“民间”？既然“官场”是官员活动的场所，那么“民间”就是民众百姓生活的地方。

不过在旧时，所谓“江湖行当”只有八大类，也称“八行”或“八门”，即 巾、皮、彩、挂、平、聊、调、团。具体地说，巾门包括卜卦算命、相面测字、画符念咒、看风水等行当。皮门，是行医卖药行当，皮门人俗称“江湖郎中”。彩门，又称“抹子行”，包括戏法、魔术、杂技、马戏、杂耍等。挂门，又称“瓜子”、“瓜子生意”、“挂子行”，包括耍枪弄棒、摔跤、打拳等。平门，包括评书、相声、单弦、大鼓等行当。聊门，即梨园行。调门，包括裱糊、画匠、杠房、吹鼓手等行当。团门，包括卖唱、乞丐、歌妓等行当。虽不是七十二行，但也五花八门。用现代的术语说，这江湖行当中有算命先生、巫师神汉、民间医生（主要是无照行医者）、魔术演员、杂技演员、摔跤运动员、耍武艺的、曲艺演员、戏剧演员、裱糊匠、画匠、吹鼓手、抬棺材的、走穴歌手、妓女、要饭的。明眼见的，我们现今所称的“演艺界”，几乎都在这江湖行当中。怪不得由“穴头”带领一些演员到各地去

* 作者为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市地方志学会秘书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演出叫‘走穴’呢,原来旧时生意场的‘切口’(即江湖隐语)将外出做生意叫‘出穴’。

列入江湖(民间)行当(职业)第一类的‘巾门’,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特殊职业之一。远古时代,原始人不懂科学,无以解释大千世界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便幻生出神的主宰和鬼的作祟;于是,神、鬼、人之间的‘沟通者’和‘传言者’巫、祝应运而生。巫、祝假借神灵,解释过去与当时发生的种种自然、社会现象,并预测、预言未来。人们便以此“凶吉”来决定他们各项活动的行止。占卜,是原始蒙昧状态下的一种产物。在原始社会里,巫、祝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有比较多的“社会经验”。他们的职能,一方面是靠幻想的超自然力量保护部落、村社、氏族及其成员,包括牲畜、农作物等不受‘恶鬼’加害,并驱赶致病作祟的“妖魔”;另一方面,他们还常常借助幻想的“巫术”来预言、来示警、来指挥部落或氏族的生产活动、宗教活动、军事活动。所以,在原始社会,巫师是普遍受到尊崇的‘神人’或‘神的代言人’,并成为氏族或部落的首领。

后来,社会发展使巫师与酋长分离,巫师退居部落‘第二把交椅’。再后来,巫师的地位江河日下不过直到商代,巫祝、巫史依旧在参与着军国大事。殷商的巫师有多方面职能,除卜筮和主持祭祀外,还要记史(记君王世系、言行及军政要务),也观天象、记天象,传播文化,施行医药等。作为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的巫史、巫祝知识‘渊博’,兼通礼仪、天文、地理、物候、农事、医药、文学,有的还是理政治国的能手,如史载的巫咸、巫贤。

战国时代,巫、史、祝、医分流。到了秦代,巫已经流落江湖,有的则被称为‘术士’。

汉朝的皇帝“独尊儒术”,后来道教兴起,佛教传播,巫不仅在“庙堂”失去了光彩,而且在“神坛”也失去了位置。如是,它只能装神弄鬼,到民间去混饭吃了。

在民间,一般的老百姓对算命先生和巫师神汉还是比较买账的。当然有愚昧和迷信的成分,但还有一些是因为摆脱不了贫穷、灾难、不幸而在求签卜卦中寻求安慰和寄托希望的。官场豪门也经常迷信算命先生和风水先生,求的是永葆荣华富贵并荫及子孙。此外,封建统治者

还会利用迷信来麻痹百姓，使他们面对压榨、奴役、穷苦却安于现状。不过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揭竿而起的‘ 江湖好汉 ’和‘ 草莽英雄 ’也会利用装神弄鬼和封建迷信来对抗官府和 “ 庙堂 ” 的专制统治。秦末，陈胜、吴广在起事之前就曾问卜。算命先生猜透他们的心意，不仅告诉他们事可成，而且暗示他们要利用神鬼来说服众人。于是陈胜和吴广在一块帛上写了 “ 陈胜王 ” 三个字，然后悄悄把它塞进鱼肚子。役卒们在吃鱼的时候，发现了鱼肚子里的帛书，十分惊异。到了晚上，陈胜又叫吴广到住地旁边的荒屋里去学狐狸叫，并用狐狸般的声音说：“ 大楚兴，陈胜王。 ” 取得役卒们迷信以后，造反就开始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张角是以‘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的口号来号召‘ 太平道 ’道众起事的。这口号,与其说是宗教语言,不如说是‘ 巫语 ”。

距现今不算很远的一次利用 “ 巫术 ” 的历史事件，是 “ 太平天国运动 ”。天王洪秀全既是‘ 拜上帝会 ’的教主,又自称‘ 天弟 ”。东王杨秀清则是上帝的代言人。每当发布重大决策，他都会以上帝的灵魂附体之名杖剑作法,疯疯癫癫,念念有词,然后宣布‘ 上帝的旨意 ”。当社会脱离了原始状态以后，“ 巫 ” 及其变种的最大破坏力不在于小民百姓的请卦求卜,而是当它与某些政权或政治势力结合以后。现代‘ 神坛 ’和‘ 庙堂 ’的香火再烧,依旧是借助于‘ 巫 ’及其变种余灰。

“ 江湖行当 ” 的其他七大门类不必细说，我们疑惑的是这其间偏偏没有农民。

二

不仅 “ 江湖行当 ” 没有农民，多数的民间起义队伍和造反者的首领也很少是纯粹扛锄种地的农民。

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有云游道士、出家和尚、庄园主、地主、渔夫、猎户、官场小吏、狱卒、军官、衙役、小贩、工匠、行医卖药的、耍枪弄棒的、吹箫唱曲的、开黑店的、私商、乡间秀才、啸聚山林的强人等,他们在‘ 江湖行当 ’的‘ 八门 ’中几乎都可以对号入座,惟独不见农夫。就是在我们称之为 “ 农民起义 ” 的队伍中，其发起者和担当主要领导角色的，也是如此。秦末大泽乡起义的首领陈胜、吴广是下

级军官,东汉黄巾起义的发起者张角是‘太平教’的教主,唐代起义军的首领黄巢是落第举子和私盐贩子，元末红巾军首领韩山童、刘福通都是白莲教教主，利用农民起义而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在加入红巾军之前是云游和尚。明末的张献忠出身行伍，李自成在起义前是银川的一个驿卒。这表明，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农业社会，农民虽属民间的重要成员，但民间最活跃最具反抗精神的还在江湖八门之中。

既然‘江湖行当’中不包括农民,那么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里,“江湖”就不能完全和‘民间’画等号了。如此,“江湖意识”、“农民意识”和“民间意识”也不应该是一个相同的概念。

对于‘农民意识”,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基本概念,这就是心胸狭窄,目光短浅,自私自利,因循守旧。但‘江湖意识’是什么,似乎是没有定论。在我的感觉中，江湖意识是与江湖义气联系在一起的，也与散漫自由、无拘无束、盲目不定的破坏性联系在一起。

“民间意识”则是某一个时期最广大群体的一种集体意识，也可以说它是来自民间并反映了多数群众所渴望所追求的一种理念。

三

在“民间意识”还没有形成强大潮势的时候，把发出民众心声的地方称做‘民间思想村落”,应该是一个十分具象的比喻。

在我国现代历史上，最早从这种“村落”里发出声音的代表人物是著写《猛回头》、《警世钟》的陈天华,主编《中国女报》、提倡男女平权并从容就义的鉴湖女侠秋瑾，还有发起成立中国学生同盟会、出版了《革命军》、死在清政府狱中的邹容。在这个‘村落’里,也曾有创立新民学会的青年毛泽东、创办觉悟社的周恩来。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知青在他们的知青点建立了‘民间思想村落”。在这种‘村落’里,有些知青聚在一起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因为他们已经怀疑‘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一些厌倦了空头政治的知青聚在一起，开始探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们已隐隐地预见到，国家和民族将会需要重建人才。当时有些知青回城探亲，随身携带的是自办的油印本自然科学

刊物，上面有探讨宇宙星空和量子物理的文章。当年，一位知青顽强地写下了厚厚的几大册语言学著作……那时候，不仅乡野山村有思想的火花，就是大城市里也有类似的“民间思想村落”。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人曾在紧闭的小屋里讨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说睡钉子床的拉赫美托夫，说屠格涅夫的《罗亭》，说“多余的人”；说赫尔岑、奥加辽夫、十二月党人……在那个年月，北京城内有许多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及平民百姓在思考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一些青年私下里传播过江青和康生的劣迹，预测过林彪及“四人帮”的下场。正是这种怀疑、思考、分析和传播，才引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总理为契机的轰轰烈烈的“天安门事件”，才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文革”中的“民间思想村落”的代表人物，当属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张志新和遇罗克。

在改革开放20年的展览会上，展出品中有安徽省凤阳地区小岗村的十几个农民顶风冒险为私搞“包干到户”所按的手印。这“包干到户”，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全国第一家，是中国广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声。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年小岗村的十几户农家，也创建了“民间思想村落”。从这个小小的“村落”里，发出了中国农民渴望解开捆在他们身上的绳索，渴望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生活的声音。

四

当今的世界，“江湖”一语在主流社会的文本中已经基本消失了。虽然它依旧在新武侠小说和影视剧中出现，但那只是“成人的童话”的语汇。昔日的“江湖八门”今犹在——聊门、平门、彩门上升为“演艺界”，其间不乏万人追捧的“明星大腕”、“超级巨星”。他们身价上亿，生活奢华，远离“民间”，早已失去了“民间意识”。曾经有过显赫历史的巾门，不只是流落江湖，而是被列入了取缔、查禁之列。有意思是调门、挂门、团门，他们中的一部分也进入了“演艺界”、“体育界”，成为“演员”或“运动员”，有的却像巾门人士的命运，成为被“清扫”的对象。

无论在当代社会的文本中有没有“江湖”的概念，“民间意识”也依然存在。“江湖八门”已经变化分解了，“民间意识”却在百姓的闲谈中、网络的帖子上延续着……

我曾送给钱钟书先生几件寿礼

戈革*

几天前，有两位客人到我这间又破旧、又拥挤从而不配称为“书房”的斗室中来，谈话间提到了钱钟书先生。我偶然提到，当钱先生满八十岁时，我曾送给他几件薄礼。他们问那是什么，我简单地回答了几句，但语焉不详，他们也全未在意。后来我想，既然此事涉及钱先生，对此感兴趣的一定人数不少，因此不如把它交代出来，或者也可供茶友们的一时谈助？

少年时听到过一句英文歌词曰：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有一天，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这是至今还常常使我这个行将就“火”的老头儿思之黯然也为之神往的。往者已矣，一切的“风华正茂”都成过眼云烟矣！且说“当我年轻时”，人们送礼还有一些确定的规格，不是拿一包巧克力或一个小玩具就能当作礼物的。现在人们的送礼方式大致已和外国“接轨”，已经不考虑、不懂得从前那些讲究了。从前中国礼物的单位不叫“件”、“种”……而叫“色”。在比较郑重的场合，礼物要配齐色数，或四色，或八色，不可随便。

当年我送给钱先生的寿礼便有四色，但各色之间的价值、性质等等却并不均衡。它们是：

(1)古玉璧一件。那是我的旧藏，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青绿色，蒲纹（即由三组互成60°角的平行线组成的花纹，如编蒲之状）。虽然并无特别精美之处，在今天却也相当难得了。

我在一篇拙文中曾经自供，一生对任何物或任何人都不曾爱到真正“入迷”（即失去理智）的地步。“造诣”最高的，就是对于古玉器的爱好，可

* 作者为中国石油大学教授。

以说“几乎”达到了“入迷”的境界。前几天偶然有故,又拿出一些藏玉来盘点一次。事后写信给上海老友乔兄说，看了这些东西，真令人“舍不得死”！

(2)古碑拓片一张。汉碑拓片,已托裱。名《西岳华山庙碑》隶书。讲碑帖的书上说,原碑已毁,而且此碑的拓片传世者只有三(四)份。因此,凡是见到我这份拓片者,都十分肯定地说是假货。我 50 年前在济南工作时，偶然在一个冷摊上买了一大堆碑帖拓片，包括这份拓片。根据印章和题字，原藏主是曲阜的一位孔先生，乃孔圣人的后代。因此我常常想，假若这一大堆当废纸买来的拓片中居然埋藏着一两件真品，那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假如是真的，那份拓片将是无价之宝！

现在我那些拓片早已在“十年浩劫”中散失殆尽了！

(3)一张画片和一首诗。画片上是一座大理石雕像，显示的是希腊神话中的一尊女神(仙),名叫“荷贝(Hebe)”。相传荷贝是奥林匹亚山上专司为诸神斟酒的神，其形象是一位年轻的美女。此像作者是丹麦历史上最伟大的雕塑家陶瓦尔森。现在哥本哈根有他的纪念馆。馆中陈列的他的作品真是洋洋大观，使你看了常感惊叹，觉得一个人一生怎么可能做出那么大量的工作！

陶瓦尔森的作风很近古典派，注重写实。他创作的“荷贝雕像”现在陈列在“卡尔斯伯荣誉府”(玻尔曾在府中住了多年)的餐厅中。那是一个上身赤裸的美女，手托酒盏，十分可爱。这张画片是我在丹麦买到的，虽然只值几元钱，但我认为很有意义。因此我把它送给钱先生，作为一色寿礼，并附小诗一首曰：

篱鹪难窥万仞墙，瓣香遥拜哲人堂，
女仙荷贝饶仪态，倩与先生捧寿觞。

【按】“藩篱之鹪”典出《庄子》,以喻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即余之自况也。“夫子之墙万仞”,见《论语》,是孔子的学生称颂老师的话,此处用颂钱先生。

(4)自书词一首。当“文革”的恶剧尚未结束时,像我这样的“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头上无时无刻不悬着一把令人胆战心惊的无形的剑。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